

日本右翼势力研究拟议

何 理

内容提要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活动越来越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本文是关于右翼势力研究的课题意向。其主旨在于研究日本右翼势力的社会历史渊源;法西斯右派势力在历史上与日本国家军国主义化和侵略战争的关系及其与当今日本右翼势力的承传关系。课题重点是通过对比右翼势力历史及其主要活动系统的理论分析,揭露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企图使日本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给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和国际和平发展环境所造成的危害。

关键词 日本右翼研究 课题意向

右翼势力是日本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军国主义化过程中的畸形产物,在日本具有很深远的社会历史渊源。在近代日本历史发展中,鼓吹极端“日本国家主义”的、激进的右派始终是日本国家和社会生活军国主义化的急先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中心,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战前、战时、战后三个不同的时期。该课题研究的中心是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体制及其发动对中国和亚洲侵略战争的关系,要从诸多方面解析日本右翼势力产生的社会历史渊源及其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说明其具体的社会阶级背景和它当时所代表的社会思潮,揭露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对日本社会和亚洲和平稳定的破坏作用。

当今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谬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正是承袭

了历史上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衣钵。当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虽然在人数和影响方面都还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国和亚洲各国友好发展,是日本人民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个历史潮流是不可改变的。但是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近代右派极端社会力量对日本政局的作用,对日本右翼势力的能量和影响以及可能给日本社会发展和亚洲国家关系造成的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当前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关注,既是出于对日本当前国家政治走向的疑虑,同时也是出于对近代日本历史的这种认识。所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不可回避的课题。

同时还应当指出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针对当前右翼势力层出不穷的言论的批判方面,而没有对与此相关的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及其理论方面的逻辑关系的深入而系统的分析,研究就难以达到科学性、与战斗性完美结合之后才可以达到的效果。如何做好研究,笔者以为下述课题内容应该引起重视。

一 关于日本右翼势力的社会历史分析

右翼势力在日本具有长远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根源。其核心是在历史上形成并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政治观、历史观,而且这两种思想在其存在与发展中又是难以分割的。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

关于“皇国史观”问题。对日本右翼思潮的批判必须对“皇国史观”作理论的和历史的分析。应该阐释的内容是:(一)“皇国史观”起源于历代王朝为神化天皇而编造的神话故事,这种故事在被彻底的政治化和法律化之后,即成为一种信念、迷信、法律和人民的思想方式、行为规范。(二)“皇国史观”是近代天皇专制主义主要的

社会意识形态支柱。以日本为“神国”，天皇乃超人的“神”，天皇的意志就是神的意志，要求国民泯灭一切人性，绝对服从“神”的意志。(三)“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和以皇道为中心的国民教育是“皇国史观”国民化的重要保障。神道教长期作为日本的国教，实行“祭政一致”宗教制度；神道的完全政治化，成为毒化国民社会意识，镇压民主思想的重要工具。(四)在关于天皇和日本的历史发展的问题上，日本国内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即进步史观与反动史观的论争。日本统治集团对民主进步思想和《神代史研究》等批判皇国论进步史学进行压制。

关于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政治观、历史观问题。军国主义是一种“军事立国”的政治观念，古代罗马就存在这种思想。近代军国主义则更多地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战争联系在一起。军国主义政治观、历史观在日本具有长期的社会影响，是法西斯右翼势力重要的思想理论渊源。应该阐释的内容是：(一)日本军国主义亚洲观、中国观的形成。日本军国主义政治观、历史观的核心是日本如何对待其与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提出的“大陆政策”和1927年的“大陆政策”，集中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形势的认识及其在与亚洲邻国关系中不平等的、弱肉强食的侵略政策。(二)“开国进取”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承袭关系。“开国进取”是明治维新的基本国策，其实际的含义是对西方开国，向东方进取，具有明显的军国主义扩张性质。近代日本长期充当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帮凶；日本对西方的屈从和对中国、朝鲜等国的侵略战争是其开国进取政策的注释。“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在亚洲侵略扩张政策的继续和发展。站在地域种族主义立场上理解所谓“大东亚战争”，是以上军国主义观念的表现，完全歪曲了战争的根本内容和性质。(三)军国主义战争和武士道精神。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另一个思想渊藪是在日本社会有深远影响的武士

道精神。武士道精神是从古代“士道”等关于武士修炼和道德规范演化而来的,其核心是“忠君事主”、“殉死效忠”、“好勇斗狠”。武士道精神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础是日本岛国文化原始的血亲宗族观念、卑怯而狭小的眼界和冒险贪欲的海盗性格的混合体。这种原始的内在社会意识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与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理论和军国主义思想相结合,从而形成日本特有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日本统治集团努力把这些东西灌输给国民,特别是日本军队,作为其“立身之本”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尚武”精神,从而使日本军队成为世界上最疯狂、残暴、野蛮的法西斯军队。

二 关于 30-40 年代日本右派社会力量 与日本社会发展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发生了急剧的重大的变化,日本从一个亚洲地区性的国家变成世界性的国家。剧烈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动荡使日本进一步强化了天皇专制主义,也使“战争暴发户”日本的扩张野心更加膨胀起来。右派法西斯组织是独立于其他政党、社会组织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是日本政府和军国主义集团中的极端派别。它充当了日本国家实现军国主义化和进行对外侵略战争的急先锋。这里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

关于日本近代天皇制和右翼势力问题。应该阐释的内容是:(一)近代天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战争的渊藪。天皇制最便于实现资本帝国主义垄断经济与封建专制制度的结合,是近代军国主义最便捷道路。(二)天皇制的反民主主义和对外侵略主义性质不可避免地成为极端专制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基础。

础。(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同时,实现了国家的军国主义化。近代日本发动了数十次战争,天皇本人都是侵略战争的元首。(四)战后美国出于一己私利,在日本保留了天皇,对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进行清算,这就使一些侵略战争的余孽得以抛头露面,重新集结成新的社会右翼势力。

关于日本军部与右派法西斯势力问题。应该阐释的内容是:

(一)“军部”是近代日本国家制度的核心。“帷幄上奏”、“统帅权独立”、“陆军大臣现役制”等特权实现了军部势力与天皇统治的直接结合,使军部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二)在这种背景下,以军部为中心,逐步形成了一种鼓吹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实行天皇极端专制主义统治的右派社会力量。这种力量通过政变、暗杀等恐怖手段,推翻政府,暗杀政敌,加速推进日本国家体制战争化,及社会政治完全法西斯化。(三)30年代日本军部的分化和法西斯右派势力的膨胀,以及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斗争。(四)军部法西斯组织的特点,即它是民主主义和政党政治的死对头。

关于30年代日本右派法西斯势力发展的特点。应该阐释的内容是:(一)日本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特点。日本“社会改造论”分析: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是以维护天皇专制主义,通过军部完成对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造,建立军事独裁,实现对外侵略为趣旨的。(二)社会法西斯组织的形成发展。从1929年“滨口事件”到1936年“二·二六”政变,完成了军部法西斯组织和社会法西斯组织的结合。(三)法西斯右派组织与日本社会政治发展趋向的关系:否定政党政治,军部控制政府,加速社会法西斯化,建立国家的侵略战争体制。

关于右派法西斯势力与全面侵华战争的关系问题。应该阐释的内容是:(一)“满洲事变”与右派法西斯组织:军部右翼激进派的

‘满洲危机’论及其对事变的策划。(二)从卢沟桥事变到上海事变:侵华战争初期的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统治集团出于不同的战略考虑,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争论,军部右翼激进派促成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出兵和全面侵略战争。(三)‘对华一击论’的鼓吹和实施。征服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基本政策,对华‘膺惩论’、‘一击论’表现了右翼激进派的狂妄企图。对华侵略战争是军国主义以上口号的鼓动,也是以上口号的破产。

关于日本战争体制的法西斯主义性质问题。应该阐释的内容是:(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民主和平力量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战争集团的斗争。日本不仅在组织上是法西斯轴心国家的重要成员,而且是最早向邻国发动侵略战争,破坏国际和平秩序的国家。(二)日本天皇法西斯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垄断经济与封建主义的结合,这是同其他法西斯国家没有多少原则区别的;但是以家族、血亲关系为纽带的日本大财阀则带有更加原始、落后和独占的性质。(三)法西斯主义特有的反民主主义的极权政治。日本不同于别国的法西斯政党专制,而是以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体制。(四)非人道主义性质:对外疯狂的侵略战争,对内残暴血腥镇压。(五)在政治上极端的“种族主义”、‘国家主义’政策和民族迫害行为,及其表现出来的法西斯主义民族残虐性。

三 关于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和右翼势力问题

战后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政治条件有利于军国主义的余孽改头换面,重新形成新的右翼势力,成为影响日本国内政治发展和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其中特别因为冷战的形成和美国对日本的利用保护政策,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未能得到彻底的整肃和清算。8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成为经济大国地

位的确立,日本国内一部分人企图脱离战后和平道路,鼓吹修改日本宪法关于限制日本战争行为的条文,重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道路。某些日本政要和右翼势力坚持军国主义立场,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翻案,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称为“自卫战争”、“解放战争”,否认日本战败投降的事实,否认东京审判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正义判决,否认日本国家战争体制的法西斯主义性质,不承认日本曾是法西斯国家。对于这些,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

关于日本军国主义“自存自卫”论的历史考察。应该考察的内容是:(一)“岛国文化”心理和历史上的海盗活动及其意识的嬗变。(二)“台湾”、“朝鲜”、“满蒙”问题与“生命线”理论的历史延续。侵占台湾、朝鲜、“满洲”等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说明“生命线”理论始终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侵略战争的政治动力和基本的对内动员。(三)从“脱亚入欧”论到“东亚盟主”论的历史线索。明治维新后日本鼓吹“脱亚入欧”,实行对西方列强屈服,对东方国家逞强的政策,自居为亚洲的“盟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西方列强争霸东方,直至发动对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提出“大东亚共荣圈”,鼓吹“自存自卫”,都是日本对外政策动员的主轴线。(四)“和平”“共荣”谎言的剖析:战时日本设立“大东亚省”,策划所谓“和平”运动,提出“建设亚洲新秩序”、“共存共荣”等口号,策划建立各国傀儡政府,强化对被侵略国家的殖民统治。日本右翼势力今天仍在宣传的“自存自卫”论和“亚洲解放”论,则是历史谎言的重复。

关于东京审判问题。应阐释的内容是:(一)东京审判的性质和历史地位。东京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理和判决是符合国际条约规定和国际法原则的,对其“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违反人道罪”等罪行的判决和惩处是正义、公正的。(二)审判的不彻底性及其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东京审判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对大量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人也未给予清算,这给日本军国主义

活动的复活埋下了引线。(三)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东京审判的主要观点之剖析:所谓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复仇仪式”;国家具有战争权,“侵略战争不是犯罪”;“自卫战争不一定在本土进行”;东条等人应“无罪释放”等等,完全是为日本的战争犯罪开脱责任。

关于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和教科书问题。应阐释的内容是:(一)废除以“教育敕语”为核心的天皇法西斯主义国民教育和战后日本历史教育改革。(二)文部省关于历史教科书的颁定和家永三郎“教科书问题”诉讼案。(三)80年代以来关于“教科书”问题的争论:教科书篡改日本侵略战争历史,否认日本战争罪行,模糊侵略战争性质。(四)日本人民应从战争中接受什么历史教训?军国主义政治观与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的较量。

关于日本向被侵略国家赔偿问题。应阐释的内容有:(一)《波茨坦公告》和国际条约关于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约定和美国对日赔偿政策的变化。(二)中日及亚洲各国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协定:国家战争赔偿的放弃和受害赔偿(个人索赔)的执行,日本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的态度。(三)战争受害损失和战后赔偿统计:日本从中国等邻国掠夺了多少财产;战后日本向亚洲被侵略国家及受害者付出了多少赔偿。(四)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和日本在民间受害者赔偿问题上的立场。

关于修改宪法与日本的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道路问题。应阐释的内容有:(一)“和平宪法”的根本所在是废除天皇专制制度和军国主义战争体制。“和平宪法”保障了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日本民主力量长期奋斗的成果,符合国际进步潮流和日本社会发展的需求。(二)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道路和日本国内复活军国主义的势力及其反宪法倾向。“和平宪法”及其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军事力量的发展,但从50年代开始在日本国内就不断出现要求修改宪法和

平性质的主张;自卫队的活动,实际已突破了“专守防卫”的范围。(三)当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鼓吹“修宪”的主要活动。“修宪”与“护宪”的斗争,关系到能否减少和避免日本重新走向军事大国的危险。(四)“安保条约”和日本的军备扩张。

关于战后日本的右翼势力和右翼组织的发展问题。应该阐释的内容有:(一)战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对军国主义“整肃”不彻底;军国主义势力的保留和重组;大批旧军政人员重返政界。(二)战后美国对日本政策的转变:重新武装日本和单独媾和;政治上、经济上对日本旧体制和战争工业基础的利用保存政策;《旧金山和约》及其影响。(三)国内右翼势力发展的主要特点。当今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国内具有比较深远的社会背景,在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组织形式、行为方式等方面,与历史上的军国主义存在着直接的承传关系。(四)当前右翼势力的组织及其重要动向。右翼势力活动是日本的耻辱,它直接伤害了中国人民和其他被侵略的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日关系和亚洲国家关系的和平发展。

以上关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的课题内容,仅是笔者基于目前研究状况的分析而提出的初步拟议,随着研究的深入,课题内容无疑还会有很大的拓展余地。

(作者何理,1937年生,国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